“两山”理念的政策脉络、实践成效与发展趋势

董战峰[1]，徐彩瑶[2, 3]
（1.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北京 100012；
2.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千万工程”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300；
3.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摘要：2025年正值“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这一理念在二十年的实践进程中，重塑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范式与行动框架。论文基于生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元学科理论系统阐释“两山”理念的理论内涵与逻辑，深入剖析政策脉络与演进特征，从“绿水青山”保护修复、“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金山银山”可持续转化保障三方面总结实践模式与成效，基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提出五大核心任务及五大发展趋势，为深化“两山”理念实践、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关键词：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理论内涵；政策演进；实践成效；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062.2；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25)08-021-12

Policy Evolution,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DONG Zhanfeng[1], XU Caiyao[2, 3]
(1.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2. Research Academy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Green Rural Revival Program Academy,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300,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300, China)

Abstract: The year of 2025 marks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which has reshaped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action framework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two decades of practic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ics,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logic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analyzes in-depth the policy vei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arts from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into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and the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of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summary of the practice mode and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we put forward five core tasks and five major tasks,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we put forward five core tasks and five major task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s and policy references for deepening the practice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and promoting establishment of a beautiful China with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Key words: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policy evolution; practice effectiveness; development trend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1]。全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紧张、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严峻，生态灾难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2]。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持续攀升的背景下，生态文明不仅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3]，更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20&ZD09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乡村建设、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浙江山区 26 县共同富裕协同机制及政策研究”（42301328）
第一作者简介：董战峰，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经济与政策、资源与环境管理。E-mail: dongzf@caep.org.cn
通讯作者简介：徐彩瑶，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E-mail: caiyao@126.com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简称“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其本质在于揭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该理念由习近平总书记于 2005 年在浙江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已成为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理念。“两山”理念从科学论断逐步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从地方经验推广至全国范围的实践探索，从观念意识转化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在政策层面，“两山”理念从最初的地方倡导，逐渐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指导思想，贯穿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之中。在实践方面，全国各地积极践行“两山”理念，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两山”理念正不断地转化为丰富多样的生动实践[5]。

2025 年恰逢“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其二十年的实践历程不仅重塑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范式与行动框架，为解码生态环境治理转型提供了关键密钥，更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系统性方案。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两山”理念在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鉴于此，系统阐释“两山”理念的理论缘起与内涵逻辑，深入研究政策脉络与演进特征，全面总结多元实践模式探索与成效，准确把握并研判其未来发展趋势，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为我国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理论支持，更能为各地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两山”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提供有益参考。

1 “两山”理念的理论缘起、内涵与逻辑

1.1 “两山”理念的理论缘起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表达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两山”理念的理论缘起于三个方面。首先，该理念深植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传统，既承袭了《周易》“生生之德”的宇宙观、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也提炼了传统农耕文明中“休耕轮作”“封山育林”等可持续实践智慧。其次，该理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是自然有机部分”的论断与《自然辩证法》中对“征服自然”的警示，升华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观，不仅回答了绿色现代化的实践命题，更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突破了西方生态理论的批判局限。此外，在应对全球生态治理困境方面，我国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探索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生的新范式。“两山”理念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从理论到实践的创造性转化，也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1.2 “两山”理念的理论内涵

“绿水青山”指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包括清洁的水源、健康的森林、生物多样性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资源。“金山银山”象征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通常指通过工业、农业等经济活动创造的直接经济价值。“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基础与转化的关系，还存在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性关系[6]。具体而言，“绿水青山”（生态资源）是“金山银山”（经济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条件，如通过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将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经济优势。此外，短期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可能破坏生态，单纯保护环境可能限制某些经济开发。长远来看，保护生态环境能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可为生态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两山”理念的内涵包含“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个递进层次[6-7]。首先，“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指明了协调共生的发展路径，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设计，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动态平衡；其次，“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确立了生态优先的底线思维，强调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发生根本冲突时，必须坚守生态红线，如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实践；最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了生态价值的转化逻辑，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彰显了“保护生态就是增值自然资本”的深刻内涵。

1.3 “两山”理念的理论逻辑

（1）基于生态经济学理论的价值转化逻辑。

自然资本理论认为，生态资源（“绿水青山”）是重要的生产性资本，即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共同构成社会总财富[8]。生态系统提供调节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等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价值。传统发展模式忽视自然资本损耗，导致“生态赤字”。“两山”理念将“绿水青山”视为可量化、可交易的自然资本，承认“绿水青山”是比货币资本更根本的财富形态，要求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核算体系，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将生态资源视为“免费投入品”的局限。不仅如此，“绿水青山”的可持续再生是“金山银山”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蕴含的气候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调节、生物多样性等生态价值与人类福祉直接相关，其数量与质量直接影响价值总量。生态价值通常被划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9]。使用价值是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当前及未来需求的能力。非使用价值是与人类实际使用无关，源于伦理或遗产认同的固有价值（表1）。

“两山”理念基于生态经济学理论的价值转化逻辑，主要体现在使用价值高效转化、非使用价值创新实现以及“生态阈值内实现价值增值”的价值可持续转化（图1）。

一是显化“隐性价值”，市场机制推动使用价值高效转化。全国已逐步健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通过GEP核算标准化将直接或间接使用价值纳入市场体系。2020年以来，全国层面以及各省级、市级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陆续发布[10]，为量化直接或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提供了技术规范，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以生态资源为基础，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生态产业，实现生态资源使用价值的多元化转化。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推动生态产业的升级，提高生态产业的竞争力和附加值，进一步促进生态资源使用价值的高效转化。

二是超越“市场失灵”，政府机制为主导促进非使用价值实现。“市场失灵”在生态资源配置中的本质原因，源于非使用价值（遗产价值、存在价值）的公共物品属性与外部性特征，导致市场机制无法自发形成有效供需均衡。“两山”理念的创新在于，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政府购买、司法刚性、品牌溢价）重构“价格”形成机制，将遗产价值、存在价值转化为可执行的经济责任或政治承诺，最终实现非使用价值的实现。具体而言，首先，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偿遗产价值保护者，如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其次，将存在价值转化为法律责任，以惩罚性赔偿迫使破坏者内化成本，如云南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最后，消费者为存在价值支付品牌附加费，通过商品交换显化非使用价值，如“熊猫经济”。

三是生态阈值约束，保障价值可持续转化。生态阈值理论强调，生态承载力存在临界点，超越阈值将导致生态功能不可逆衰退的系统性风险，引发系统崩溃[11]。阈值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与层级性，可分为阈值点或阈值带[12]，即系统发生不可逆质变的临界点或系统状态渐变但可恢复的过渡区。作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本，生态系统的存续依赖阈值管理。生态系统的阈值管理是基于生态阈值理论构建的分级预警与干预体系，通过识别黄色阈值带（生态系统可自我调节恢复）、橙色阈值带（需人为排除干扰恢复平衡）和红色阈值点（不可逆崩溃点），实施差异化管控策略（如自然修复、污染治理或红线禁

表1 “两山”理念基于生态经济学理论的价值转化逻辑

类别	子类	内涵	价值转化方式	“两山”实践案例
使用价值	直接使用价值	可直接消费的物质产品（木材、食物等）与服务（旅游、康养）的价值	市场路径	浙江丽水市建立以“丽水山耕”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的全产业链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成为丽水践行“两山”理念的新模式、新途径。“丽水山耕”成功注册成为全国首个含有地级市名的集体商标。根据2017年我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显示，“丽水山耕”品牌价值26.59亿元，在百强榜排名第64位（参见：《丽水山耕：品牌溢价下的有效机制》，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jljqstcpjzsxjz/jdal/202108/t20210827_1294852_ext.html）
	间接使用价值	支撑生命系统、无法商品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固碳释氧、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等）的价值	政府路径为主	为破解森林资源难变现、集体林质量难提高等问题，福建三明市2019年启动林票制度改革试点，鼓励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将与村集体、林农合作共有的林权份额化、价值化，制发成可流转、可质押的收益凭证。据三明市林业局统计，截至2024年，三明市累计制发林票总额7.68亿元，惠及近8万人，全市有411个村开展林票制度改革试点，试点村通过收取林地使用费等，每年为村集体增收5万元以上（参见：《聚焦碳汇丨好生态能变现 好空气能卖钱——看福建三明的“绿色银行”》，https://www.xinhuanet.com/20240814/1cc8d57223da4ea28eef78e31563f189/c.html）
	选择价值	为未来能利用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	市场、政府路径相结合	我国于2015年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正式设立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2022年明确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为了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构建国土空间保护新格局，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拟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草案已首次审议（参见：《国家公园法草案首次审议 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https://www.forestry.gov.cn/c/www/zhzs/585184.jhtml）
非使用价值	遗产价值	为后代遗留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支付意愿（如大熊猫栖息地、三江源湿地）	政府路径为主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设立的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2016年3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正式印发，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由此开启。截至2019年，青海省财政共投入4.34亿元资金，户均年收入增加21 600元（参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三江源国家公园蹲点采访报道之二》，http://www.qinghai.gov.cn/ztzl/system/2019/04/22/010329196.shtml）
	存在价值	人们为确保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继续存在的支付意愿，是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价值	政府路径为主	云南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在准确评判案涉水电站建设重大环境风险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守护绿孔雀等濒危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力司法，本案明确了认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裁判规则，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具有统一法律适用价值（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年环境资源审判有重大影响力案件》，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7331.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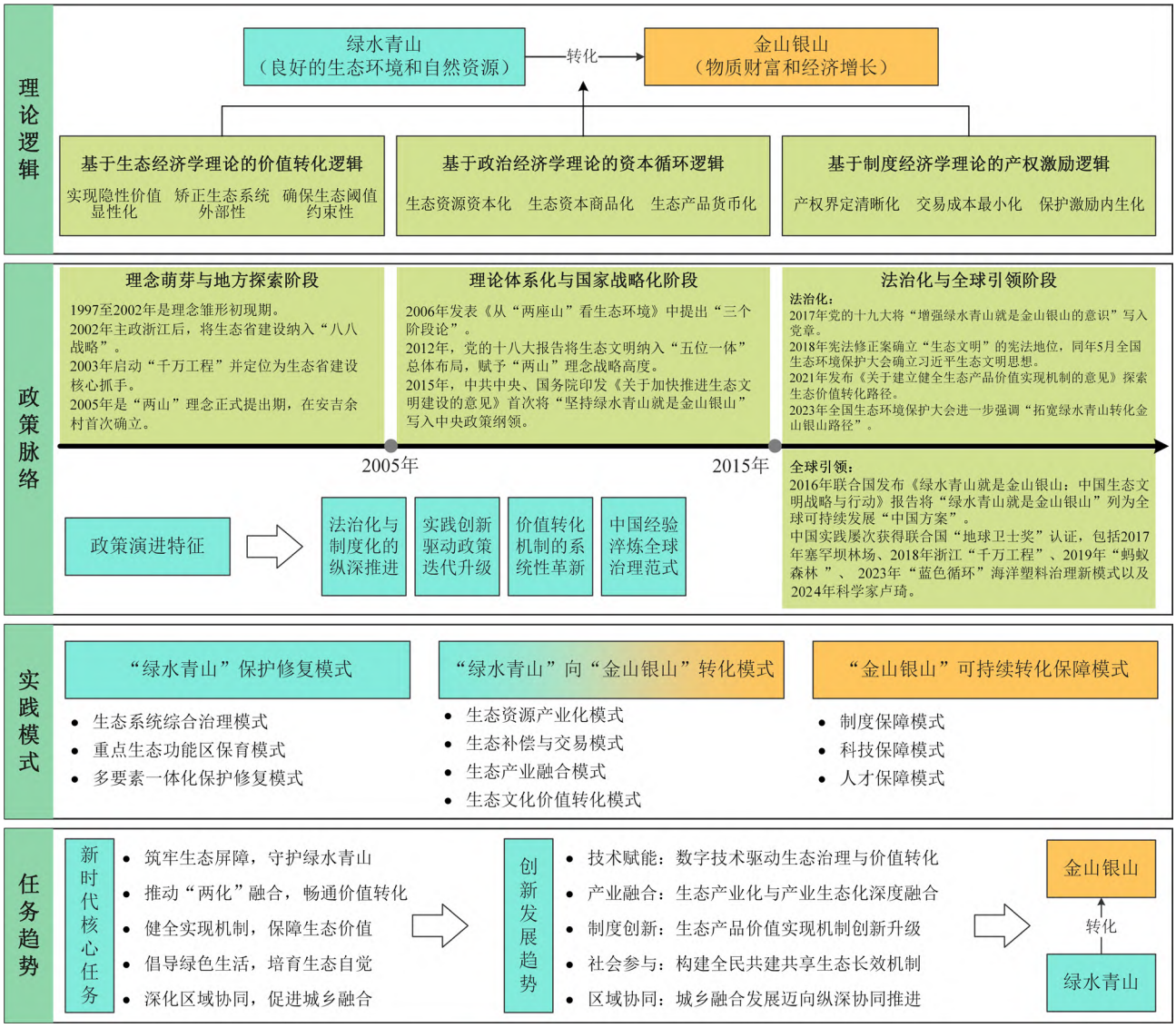

图1 “两山”理念的理论逻辑、政策脉络、实践模式与发展趋势

止开发），以维持生态系统恢复力并规避不可逆退化风险[12]，为“两山”理念中“绿水青山”的存续提供刚性保障，同时其阈值点或阈值带预警机制，能够支撑向“金山银山”的可持续转化。

（2）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资本循环逻辑。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物的有用性）和交换价值（交换比例）。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劳动时间是衡量价值量的尺度。自然物本身不创造价值，但作为劳动对象和资料参与使用价值的形成。基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辩证关系，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载体，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无法成为商品，但使用价值本身不决定价值量（如空气有巨大使用价值却无交换价值）。自然系统本身蕴含的“生态生产力”是使用价值的源泉[13]，其价值通过可持续劳动（如生态修复）转化为经济财富（“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例如，土地肥力、生物多样性等，虽不直接创造交换价值，但能倍增人类劳动产出的使用价值（肥沃土地使等量劳动产出更多粮食）。“两山”理念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资本逻辑，本质是通过重构自然资本的循环与增值机制，将生态系统资源升维为增值型生态资本，纳入“货币资本 G →生产资本 W →商品资本 P →货币资本 G’”的资本循环链条[14]（表 2），推动生态系统的“条件优势”转化为“资源优势”并最终升级为“经济优势”，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跃迁。

一是生态资源资本化（货币资本 G →生产资本 W）。生态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非排他性、竞争性）导致“公地悲剧”，无法直接成为资本。生态资源成为生态资产的重要前提是稀缺性、明晰的产权和能够产生效益[15]。在生态资产产权清晰的前提下，政府、企业、个人通过资本化运营实现生态资本价值及其增值的过程是为生态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资产资本化[15]。因此，生态资源通过产权界定，借助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获得可交易的资本属性，从“无偿自然条件”升维为“有偿生产要素”（W），这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和价值增值的基础。

二是生态资本商品化（生产资本 W →商品资本 P）。生态生产资本（W）通过自然力和人类劳动的协同共创，转化为具交换价值的商品资本（P），破解“生态服务无形化”困境。一方面是自然力贡献，生态系统无偿提供“自然劳动”（如森林固碳、水源净化），创造生态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通过管护（防火、抚育）将自然力转化为可交易的生态产品（P），凝结抽象劳动价值。

三是生态产品货币化（商品资本 P →货币资本 G’）。生态商品资本（P）通过市场化交易或产业链嵌入实现增值（G’），并以社会主义分配机制确保剩余价值（m）回馈生态再生产。价值实现路径不仅包括经营性生态产品通过市场定价实现剩余价值（m），还包括公共性生态产品通过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方式间接变现。除此之外，剩余价值（m）通过社会主义分配机制反哺“绿水青山”，进一步推进生态公平，实现劳动者、集体、社会三方共享生态保护成果，为破解“生态退化—增长停滞”恶性循环提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

（3）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产权激励逻辑。

“两山”理念的制度经济学理论逻辑，核心在于通过产权界定清晰化、交易成本最小化、保护激励内生化等制度设计破解生态资源的“公地悲剧”和转化梗阻（图 1）。

一是产权界定清晰化，破解“公地悲剧”的制度基石。生态资源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该类资源作为兼具非排他性与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若缺乏明晰界定资源使用者与管理者的权利与义务的制度安排，其退化将不可避免，陷入“公地悲剧”与“价值耗散”困境[16]。基于科斯定理，清晰的产权界定能通过市场交易解决外部性问题，当交易成本趋近于零时，资源会自动流向最高效的使用者，实现资源最优配置[17]。目前，全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统一登记体系已覆盖自然保护地、森林、湿地、草原、河流、湖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海域、无居民海岛等各类自然资源①，使生态资产具备法律认可的“身份证”，为交易奠定基础。

二是交易成本最小化，激活要素流动的关键支撑。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提出，交易成本过高会阻碍市场形成。生态产品因度量难、定价难、抵押难，传统模式交易成本畸高。标准化核算体系降低度量成本，如丽水市首创 GEP 核算标准，量化水源涵养、碳汇等无形服务价值，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核算体系②；数字化平台优化交易流程，如福建三明市搭建林权流转与金融服务网③，整合评估、保险、收储功能；浙江丽水“天眼守望”平台连通卫星数据④，实现 GEP 一键核算与交易，纠纷处理效率提升。金融工具创新压缩融资成本，如推广“林权抵押贷”“碳汇收益权质押贷”等产品，三明市发放“福林贷”等普惠贷款，丽水市深化“生态信用贷”等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三是保护激励内生化，可持续治理的核心保障。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指出，有效的制度应该能够激励相关人员积极维护和执行制度，而不是通过外部强制力来维持，这种激励相容的机制能够确保制度的

表2 “两山”理念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资本循环逻辑

阶段	政治经济学内涵	“两山”实践案例
货币资本→生产资本（G → W）	货币资本购买生态资源经营权	浙江省丽水市出台《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办证和抵押规范》等系列市级标准，规范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拓展经营权权能，进一步落实农民经营自主权，深化林地经营权流转。截至 2023 年底，全市累计流转林地 216 万亩（1 亩约等于 0.066 7 公顷，全文同），发放林地经营权流转证 1 300 余本（参见：《推进林业改革发展 释放森林生态价值——浙江省丽水市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的实践》，https://www.forestry.gov.cn/c/www/gggddt/582439.jhtml）
生产资本→商品资本（W → P）	自然力（固碳）+ 人类劳动（抚育）生产生态产品	在制度牵引下，浙江省龙泉市公益林建设的生态效能得到显著提升。2022 年公益林公报显示，龙泉市公益林生物总量 1 850.28 万吨、年吸收二氧化碳 240.27 万吨、释放氧气 149.36 万吨、调蓄水量 5.87 亿吨、减少土壤流失量 427.24 万吨、积累营养物质 0.65 万吨。全市公益林森林生态总效益 125.64 亿元，充分发挥了生态林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提供优良游憩环境的重要作用（参见：《浙江龙泉公益林绿了青山富了百姓》，https://www.forestry.gov.cn/c/www/stgtlh/605098.jhtml）
商品资本→增值货币（P → G’）	生态产品通过交易实现剩余价值	浙江省安吉县碳汇改革拓宽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实现了企业降本、农户增收的新发展格局。截至 2025 年 4 月，完成竹林碳汇核证面积 4.92 万亩，生态环境厅减排量备案 14.18 万吨，累计 23 家企业购买碳汇 2.5 万吨，交易额 173 万元，向杭州亚组委捐赠碳汇 2.1 万吨（参见：《安吉县大力推动竹林碳汇改革 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http://lyj.zj.gov.cn/art/2025/4/16/art_1277846_59097218.html）

① 参见：《我国基本形成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体系》，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4/content_6947198.htm。

② 参见：《丽水市建立 GEP “六进”制度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成果应用》，http://fgw.lishui.gov.cn/art/2021/1/21/art_1229278588_58720103.html。

③ 参见：《三明开通林权流转与金融服务网 林业与银行融合》，https://sm.fjsen.com/2014-12/03/content_15327424.htm。

④ 参见：《丽水擦亮“天眼、地眼、人眼”，升级生态环境监管体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12410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自我实施，减少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18]。“两山”理念的实践通过重构制度激励理论以实现保护激励内生化。在经济激励方面，将碳汇分红、生态产品收益分成等物质收益专属化，使保护行为的边际收益超越破坏行为；在社会激励方面，依托生态信用体系和社区声誉评价，将生态责任转化为社会资本增值；在制度激励方面，通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法治化惩戒刚性，形成破坏行为的超额成本约束。这三重激励协同推动主体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守护”，使“绿水青山”的保护从道德呼吁升级为利益驱动，从政策任务转化为市场理性，最终构建了“保护即发展”的可持续治理范式。唯有让生态守护者成为经济受益者，“绿水青山”才能成为永不枯竭的“金山银山”。

2 “两山”理念指引下的政策脉络与演进特征

2.1 “两山”理念的政策脉络

“两山”理念的政策演进脉络主要包括理念萌芽与地方探索阶段、理论体系化与国家战略化阶段以及法治化与全球引领阶段（图 1）。

一是理念萌芽与地方探索阶段（2005 年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主政期间已形成系统的生态发展观。1997—2002 年是理论雏形初现期。1997 年于福建三明提出“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在《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一文中批判粗放发展“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吃祖宗饭，断子孙路”；2002 年主政浙江后，将生态省建设纳入“八八战略”，启动生态经济体系构建，为“两山”理念奠定实践基础。实践载体创新（2004 年）：2004 年 7 月定位“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为生态省建设核心抓手，明确其“护绿水青山、创金山银山”的双重功能。2005 年是理念正式提出期。2005 年 8 月在安吉余村首次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阐释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这一阶段从“无价之宝”到“两山”的概念演进，标志着生态文明理论的地方化探索完成关键跃升，为全国实践奠定哲学与方法论根基。

二是理论体系化与国家战略化阶段（2006—2015 年）。2006 年进一步阐述理念的核心内涵，习近平同志在《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中提出“三个阶段论”，将“两山”关系划分为“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标志着理念的体系化。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赋予“两山”理念战略高度。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中央政策纲领，完成从地方实践到国家意志的跃升。这一阶段通过理论凝练、制度锚定、政策法定，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倡导到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跨越。

三是法治化与全球引领阶段（2016 年至今）。国内法治化纵深推进层面，2017 年党的十九大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2018 年宪法修正案确立“生态文明”的宪法地位，同年 5 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两山”理念成为其核心；2020 年和 2022 年先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专项立法，2021 年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2023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进一步强调“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路径”。全球引领层面，2016 年联合国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列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方案”；我国实践更屡次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认证，包括 2017 年塞罕坝林场、2018 年浙江“千万工程”、2019 年“蚂蚁森林”、2023 年“蓝色循环”海洋塑料治理新模式等。除此之外，我国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倡议输出生态治理经验，主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贡献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提出“双碳”目标并制定路线图，推动“两山”理念从我国实践升华为全球生态治理共识。这一阶段通过党章宪法奠基、专项立法实践、国际认证推广，“两山”理念完成了从我国实践到人类可持续发展公共品的升华，彰显了生态文明全球话语权的崛起。

2.2 “两山”理念的政策演进特征

一是法治化与制度化的纵深推进。“两山”理念演进始终以法治保障和制度构建为核心脉络，从理念萌芽期的基层探索，到写入党章和宪法等国家战略期的顶层设计强化，后续更通过专项立法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破解操作难题，形成“宪法—法律—政策”三级制度体系，实现生态治理从行政主导模式向法治保障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要求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生态价值转化构筑刚性约束和长效保障。

二是实践创新驱动政策迭代升级。“两山”理念演进过程凸显“实践—总结—升级”的螺旋式推进特征，构建起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双向赋能的动态演进机制。以浙江“千万工程”为先导，其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经验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蓝本；新安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首创“水质考核 + 资金补偿”模式，推动全国横向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态补偿机制框架构建；福建南平“生态银行”通过整合碎片化生态资源，为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政策创新提供实践范式。这种“地方试点—经验提炼—制度推广”的迭代路径，使政策体系在回应实践需求中持续优化，实现政策供给与治理效能的精准匹配。

三是价值转化机制的系统性革新。“两山”理念政策焦点始终锚定破解“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经济转化瓶颈。通过立法界定生态资源产权、构建市场交易体系、培育绿色产业，打通“资源—资产—资本”转化通道。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更是直指生态产品“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痛点。政策设计从单一环保目标转向生态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竞争力的质变跃升。

四是中国经验淬炼全球治理范式。“两山”理念演进路径完成“中国实践—国际认可—全球范式”的三级跨越。塞罕坝林场生态修复奇迹、库布齐沙漠治理模式成为全球生态修复典范；“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倡议为共建国家提供生态合作新路径。通过主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谈判、推动绿色“南南合作”等行动，我国将“两山”理念的政策实践升华为全球生态治理共识，展现出中国方案在破解生态与发展矛盾、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优势与责任担当，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两山”理念以其科学的理论逻辑、鲜明的实践导向和深远的全球意义，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从地方经验到国家战略，从理念创新到制度构建，“两山”理念正引领我国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共进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径。未来，随着“双碳”目标推进和美丽中国建设深化，“两山”理念将持续释放动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具活力的中国样本。

3 “两山”理念的实践模式探索与成效

3.1 “绿水青山”的保护修复模式与成效

（1）生态系统综合治理模式。生态系统综合治理模式以生态系统整体性原理为基石，秉持系统思维，统筹考量生态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与协同作用，综合运用工程技术、生物措施、管理政策等多元手段，对受损或退化的生态系统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性修复与持续性保护。该模式突破传统单一要素治理的局限性，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功能稳定性与过程连续性出发，构建起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污染防治、生态功能提升等多目标协同推进的治理体系，致力于实现生态系统质量的全面优化与可持续发展，为“绿水青山”筑牢生态根基。实践中，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是一个典型案例。面对流域内水污染、岸线破坏、湿地退化及生物多样性受损等复杂问题，治理过程中同步推进水污染治理工程，通过建设污水处理厂、整治入河排污口等措施改善水质；开展岸线修复，清理非法码头与违建，恢复自然河岸形态；加强湿地保护与恢复，实施退耕还湿、湿地补水等工程；建立珍稀鱼类保护区，增殖放流保护生物多样性。通过多手段协同发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水质提升，生物种群数量逐渐恢复，充分彰显了生态系统综合治理模式系统性与整体性的优势。

（2）重点生态功能区保育模式。重点生态功能区保育模式聚焦于具有关键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等生态功能的区域，通过科学评估与精准划定功能区范围，制定因地制宜、差异化的保护策略，构建严格且完善的生态管控机制。该模式严格限制或禁止与生态保护功能相悖的开发活动，同时积极开展针对性强的生态修复工程，旨在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强化生态系统稳定性，从而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绿水青山”的核心生态价值。实践中，以三江源地区为例，作为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与高原生物多样性宝库，当地实施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一系列保育措施。通过退牧还草工程，减少过度放牧对草原生态的破坏，恢复草原植被覆盖；开展生态移民，将部分牧民迁至适宜居住区域，降低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环境的干扰。此外，设立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让当地居民参与生态保护工作，既解决了民生问题，又增强了生态保护力量。经过多年努力，三江源地区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达 6% 以上[①]，藏羚羊等珍稀物种数量显著增加，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双赢，凸显了重点生态功能区保育模式精准定位、协调发展的特点。

（3）多要素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多要素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以“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视作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与要素分割壁垒，以流域或特定区域为单元，进行统一规划、统筹布局、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通过整合各类生态要素的治理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协同实施修复措施，提升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与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绿水青山”的可持续发展。在黄土高原的治理

① 参见：《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生态环境状况持续向好》，http://www.qinghai.gov.cn/zwgk/system/2023/12/23/030032959.s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实践中，多要素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成效显著。针对该区域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综合运用植被恢复、梯田改造、淤地坝建设等措施。通过植树种草恢复植被，提高植被覆盖率，增强水土保持能力；开展梯田改造，改变地形地貌，减少坡面径流，降低土壤侵蚀；建设淤地坝拦截泥沙，淤地造田，增加耕地资源。同时，考虑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发展生态农业与特色林果业，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此外，祁连山地区的生态修复中，甘肃、青海两省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共同推进矿山修复、湿地保护等工作，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实现了生态修复效益的最大化，充分体现了多要素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全要素统筹、跨区域协同的特点。

3.2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模式创新与成效

（1）生态资源产业化模式。

生态资源产业化模式以生态资源资产化、市场化、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通过科学规划、技术创新与产业整合，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生态服务转化为市场化产业形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该模式以生态承载力为约束，基于资源调查与价值评估，对森林、湿地等生态资产进行确权管理，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创新经营模式和延伸产业链，发展生态产品、服务及旅游产业，在保护中创造经济价值，是践行“两山”理念的核心转化路径。

一是生态旅游驱动型。生态旅游驱动模式是实现“绿水青山”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以独特生态资源为核心吸引力，通过场景化设计将自然景观、文化遗产与体验活动深度融合，强调当地居民在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容量管控和环境监测平衡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并突破传统观光游模式，向“生态 +”多元业态延伸，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例如，江西婺源将古村落、梯田花海与民俗文化结合，打造“油菜花节”“晒秋景观”等 IP；2024 年，婺源县接待游客量 2 803.7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76.2 亿元[①]。三江源国家公园通过“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将牧民转化为生态管护者和获益者，人均年增收 2.16 万元[②]。重庆武隆区探索“生态环境社会化保护 + 生态旅游市场化运作 + 生态红利全域化共享”路径，开发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等产品，2023 年接待游客 4 494.24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17.23 亿元，同比增长 10.03%[③]。

二是生态产品品牌化型。以权威认证为基础，建立严格的生产标准和质量控制体系；通过文化符号植入和故事化营销提升产品附加值，构建“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利用电商平台和智慧化管理提升市场渗透率，通过数据驱动优化供应链，提升市场响应速度；部分地区通过区域公用品牌整合分散资源，实现“小特产”向“大产业”升级。例如，“丽水山耕”是全国首个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的地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生态产品品牌化型模式的典型代表，通过整合区域内农产品资源，打造统一品牌，实现了生态产品的价值提升和农民增收。“丽水山耕”品牌销售额从最初的 5.6 亿元跃升至 2024 年的 53.7 亿元[④]，五次登上“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地级市榜首，为全国地方区域公用品牌发展提供了样板。

（2）生态补偿与交易模式。

生态补偿与交易模式是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基础，通过经济手段调节生态保护与利用行为的制度安排。该模式旨在解决生态保护外部性问题，通过构建纵向生态补偿、横向生态补偿、市场化权益交易等机制，实现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间的利益平衡，推动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一是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依托纵向与横向补偿体系，构建起覆盖全域的生态价值平衡框架。纵向生态补偿以中央及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为核心，着重保障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可持续发展。以三江源保护区为例，国家年均投入生态补偿资金超 16 亿元，为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生态功能的修复与维持提供坚实支撑。横向生态补偿则聚焦流域上下游、区域间的协同治理，通过协商建立权责清晰的补偿机制。典型如新安江流域跨省补偿试点，浙江、安徽两省以水质监测结果为基准，构建“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动态补偿体系。

二是权益交易市场化探索。权益交易市场化通过制度创新，将资源使用权、环境治理权、生态收益权等生态经济价值要素纳入市场化交易体系，以价格机制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生态权益的货币化转化，如碳汇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碳汇交易是将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转化为可交易的碳指标，如福建三明开发“林

① 参见：《江西婺源县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文化赋能，乡村旅游谋“长红”》，https://www.zgsr.gov.cn/zgsr/jrsr/202501/89160cc1558c41a5adb2260b43c2df3e.shtml。

② 参见：《牵手社区共建共管“家门口”的国家公园》，https://www.forestry.gov.cn/c/www/xwdt/586694.jhtml。

③ 参见：《重庆创新推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http://www.ce.cn/cysc//stwm/gd/202406/12/t20240612_39034586.shtml。

④ 参见：《市生态农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我市发布“丽水山耕”品牌发展蓝皮书》，https://www.lishui.gov.cn/art/2024/12/18/art_1229218390_57366926.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业碳票”，将森林碳汇量化为可交易资产。截至2023年年底，福建三明市已累计开发林业碳票项目49个，累计制发林业碳票106张，涉及森林面积33.94万亩、碳减排量112.2万吨，累计交易量10.8万吨，交易金额150.9万元①，推动“造林—固碳—增收”的良性循环。排污权交易则以企业污染物排放指标为交易标的，通过市场机制倒逼企业节能减排。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开展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为例，企业可在核定排放指标范围内进行交易，激励企业主动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降低污染物排放，推动环境治理从行政管控向市场调节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

（3）生态产业融合模式。

生态产业融合模式是指以生态资源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生态资源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创新发展模式[19]。该模式通过整合生态、经济、社会要素，构建跨产业、跨领域的复合型产业体系，旨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重要实践路径。

一是生态农业融合模式。以生态农业为基础，推动农业与加工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体系，呈现出循环经济导向、功能复合拓展、技术集成应用的特点。具体而言，通过种养结合、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构建“种植—养殖—加工—废弃物再利用”的闭合循环，如浙江安吉发展“以竹代塑”产业，将竹材加工剩余物转化为竹纤维、竹炭等产品，提升资源利用率；突破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延伸出生态观光、农耕体验、科普教育等多元价值；整合物联网监测、有机栽培、绿色防控等技术，实现农产品品质与生态效益双提升，如云南哀牢山“褚橙庄园”通过数字化水肥管理系统，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农药使用量。

二是生态工业融合模式。以生态工业理论为指导，推动工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构建低消耗、低排放的产业体系，呈现出产业共生网络、绿色技术创新、区域协同治理的特点。具体而言，通过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建立企业间资源共享、副产品互用的产业共生链，如山东鲁北化工园区形成“磷铵—硫酸—水泥”联产体系，实现废弃物零排放；聚焦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推动工业技术生态化升级；打破行政壁垒，构建跨区域生态工业协作机制，如长江经济带推行“上中下游产业联动”模式，形成区域生态工业链。

三是生态服务业融合模式。以生态资源为核心，推动生态服务与旅游、康养、数字技术等产业的融合创新。具体而言，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生态服务功能转化为经济价值，如浙江丽水通过GEP核算将森林碳汇、水源涵养等服务打包开发为旅游产品，带动年旅游收入增长；催生生态康养、自然教育、生态大数据等新兴业态；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构建生态服务交易平台，如贵州“生态云”平台整合全省生态数据，开发碳汇交易、生态监测等服务，推动生态资源数字化交易。

四是跨界复合融合模式。突破产业边界，实现生态资源与多产业的跨界融合，形成复合型产业生态。核心特点在于：首先，推动全要素系统整合，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要素与一二三产业资源，构建跨领域融合体系；其次，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建立政府、企业、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最后，依托区域生态优势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品牌，实现区域品牌赋能。例如，安吉白茶通过“生态种植+文化体验+电商销售”模式，2024年产量达到2 420吨，一产产值37.7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68.45亿元，连续15年入围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品牌价值达54.86亿元②。

（4）生态文化价值转化模式。

生态文化价值转化模式以生态文化资源为载体，通过创意设计、技术赋能与产业融合，将自然景观中的文化内涵、生态智慧及地域特色转化为具有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的产品、服务或体验。该模式立足生态—文化耦合关系，运用现代手段对资源进行系统挖掘、创新表达与市场运营，推动原生文化资源向可消费、可传播的产品形态转化，实现文化保护传承与经济发展的统一，是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价值实现路径。

一是传统生态知识活化转化模式。以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智慧、农耕文化为核心，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与产业载体实现文化基因的保护性开发。这一模式的核心特点在于：首先，实现知识体系系统性传承，对梯田耕作、林业管理等传统生态实践进行系统性挖掘与数字化记录，如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的“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系统③，通过建立农耕文化博物馆、口述史数据库，实现传统灌溉技术、物种选育知识的活态保存；其次，推动产业载体创新融合，将传统知识与现代农业、文旅

① 参见：《出山入海，林业碳票“探路”记》，https://www.fj.gov.cn/zwgk/ztzl/sxzygwzxsgzx/sdjj/lsjj/202404/t20240424_6438920.htm。

② 参见：《安吉白茶：茶旅融合的“新绿”之路》，http://www.sannongbrand.com/xwkd/qtmtbd/11758.html。

③ 参见：《在云南红河，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生态系统传承千年》，https://www.alsk.gov.cn/info/1192/74158.htm。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产业深度融合，如贵州从江“稻鱼鸭共生系统”结合有机种植与体验旅游，同时通过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强化文化品牌价值[①]；最后，社区参与式保护机制作为保障，通过建立“文化传承人 + 村民合作社”的协同模式，使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形成良性循环。

二是自然景观文化符号转化模式。以自然景观的美学价值、文化象征为基础，通过艺术创作、品牌塑造、数字技术等手段，将生态景观转化为具有文化标识性的 IP 资源。这一模式的核心特点在于：首先，推进文化符号抽象与重构，提炼自然景观的文化意象并赋予现代诠释。如黄山“松云石”景观通过摄影艺术、文创设计转化为“黄山印象”系列产品，使自然景观从物理空间转化为文化消费符号；其次，加快数字技术赋能场景创新，通过运用 VR、AR 技术构建沉浸式生态文化体验场景，如张家界元宇宙馆，将张家界的自然文化和前沿元宇宙技术创新结合，实现了虚与实的交融、科技与人文的对话；最后，推动区域文化品牌体系构建，以自然景观为核心整合地域文化要素，如浙江“诗路文化带”串联钱塘江、瓯江等流域的山水景观与诗词文化，通过打造“浙东唐诗之路”旅游线路，实现文化 IP 与生态旅游的协同增值。

三是生态文化教育赋能模式。以生态文化资源为教育载体，通过知识传播、价值塑造等方式，将生态文化价值转化为社会认知资本与人力资本。这一模式的核心特点在于：首先，推动教育内容体系化建构，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文化内涵开发标准化教育课程，如浙江临安以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为基地，通过“天目少年工程院”等平台构建研学课程体系，形成“教育—保护—产业”复合价值链；其次，推动教育场景多元化拓展，打造“实地体验 + 数字课堂 + 社区参与”的立体教育网络，实现生态教育与治理协同；最后，推进教育成果社会化转化，通过生态文化教育培育公众环保行为习惯，推动形成“文化认同—行为参与—政策支持”的生态治理共同体。

3.3 “金山银山”的可持续转化保障模式与成效

（1）制度保障模式。制度保障模式是“金山银山”可持续转化的核心基石，通过构建系统化、法治化的制度体系，为生态经济发展提供长效机制。我国已建立起涵盖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等领域的制度框架，以统筹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在生态保护制度层面，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划定了生态功能极重要区、生态环境极敏感脆弱区的保护边界，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 25%[②]，从空间上为生态系统筑牢安全屏障。生态补偿制度则建立了多元化的补偿机制，中央财政设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023 年下达资金 1 061 亿元[③]，用于支持地方生态保护工作；流域生态补偿方面，新安江流域试点开创了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三轮试点，推动跨省界断面水质从Ⅳ类提升至连续 12 年稳定Ⅱ类[④]，2023 年提档升级为“样板区”后，年补偿资金增至 10 亿元，并拓展至产业与人才协同，实现了“谁保护、谁受益；谁破坏、谁付费”的良性循环，为长江黄河全流域补偿提供范式。资源开发管理制度强调绿色发展导向，通过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规范开发行为。以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为例，推行“净矿”出让模式，明确生态修复责任与要求，促进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2）科技保障模式。科技保障模式是推动“金山银山”可持续转化的关键动力，依托科技创新实现生态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产业转型升级。我国在生态修复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生态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等领域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构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在生态修复技术方面，针对矿山修复、湿地恢复等难题，一系列先进技术被研发并推广运用。例如，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中，运用“适地适树 + 工程措施”技术体系，结合无人机播种、土壤改良剂应用等手段，使植被覆盖率提升至 63% 以上[⑤]；在湿地修复领域，开发出基于生态水文调控的湿地生态系统恢复技术，有效提升湿地生态功能。清洁能源技术创新推动能源结构转型。我国光伏、风电技术全球领先，2023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 36.2%[⑥]。生态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提升产品附加值，如在农产品加工领域，超高压处理、生物发酵等技术的应用，延长了产品保质期，保留了营养成分，提升产品溢价。同时，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赋能生态产业，通过搭建生态产品溯源平台、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实现生产、销售全流程透明化，增强消费者信任，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3）人才保障模式。人才保障模式是“金山银山”可

① 参见：《从江县推广稻鱼鸭复合系统成功打造省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点》，https://www.congjiang.gov.cn/xwzx/jryw/202406/t20240620_84894212.html。

② 参见：《我国四分之一陆域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https://www.gov.cn/xinwen/2021-07/09/content_5623889.htm。

③ 参见：《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https://yss.mof.gov.cn/ybxzyzf/zdstgnqzyzf/202305/t20230508_3883153.htm。

④ 参见：《守护一江清水，构建“共赢”样板》，http://ah.people.com.cn/n2/2024/0705/c401574-40901822.html。

⑤ 参见：《黄土高原由“黄”转“绿”植被覆盖率达 63% 以上》，https://www.forestry.gov.cn/c/www/lcdt/512870.jhtml。

⑥ 参见：《国家能源局发布 2023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https://www.nea.gov.cn/2024-01/26/c_1310762246.htm。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持续转化的智力支撑，通过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为生态经济发展注入创新活力。我国构建了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体系，涵盖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人才引进等方面。学历教育方面，高校开设生态环境、绿色产业相关专业，加强学科建设与课程体系优化。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设立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每年为社会输送数千名高素质专业人才。职业培训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农业农村部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划，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提升农民生态种植、养殖技术水平；地方政府联合企业举办生态产业技能培训班，如浙江安吉针对竹产业、白茶产业开展专项培训，培养了大批懂技术、善经营的产业人才。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吸引高端人才与创新团队，各地通过提供科研经费、住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与国内优秀人才投身生态产业。同时，注重乡土人才培育，鼓励返乡创业人才将新技术、新理念引入乡村，带动当地生态产业发展，形成人才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4 “两山”理念实践的新时代任务与创新发展趋势

4.1 “两山”理念实践的新时代核心任务

（1）筑牢生态屏障，守护绿水青山。在新时代背景下，筑牢生态屏障是“两山”理念实践的根基性任务。需以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保护为目标，强化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系统治理。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对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监测与科学评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精准识别生态风险。同时，加强生态修复技术创新，针对矿山、湿地、荒漠等退化生态系统，研发推广适地性修复技术，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推动“两化”融合，畅通价值转化。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深度融合，是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的关键路径。一方面，加快生态资源产业化进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体系，依托生态资源确权登记和市场化交易平台，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生态产品，如碳汇、水权、生态旅游特许经营权等；另一方面，加速传统产业生态化转型，在农业、工业、服务业领域全面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和循环经济模式。通过“两化”融合，打通生态价值转化的堵点，提升生态经济发展质量。

（3）健全实现机制，保障生态价值。加强生态价值持续实现的制度保障是健全“两山”理念实践的长效机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扩大补偿范围，创新补偿方式，推动流域横向补偿、生态服务付费等市场化机制的广泛应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与 GDP 协同考核，将生态保护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加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明确损害责任主体和赔偿标准，形成生态保护的刚性约束。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治理，通过 PPP 模式、绿色金融等方式，拓宽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的资金来源渠道。

（4）倡导绿色生活，培育生态自觉。培育全民生态自觉，是“两山”理念实践的社会基础。通过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宣传体系，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科普活动和主题实践活动，提升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认知水平和保护意识。推广绿色消费模式，引导公众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和服务，支持生态农产品、环保家居、新能源汽车等消费市场发展。鼓励公众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环保志愿服务等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

（5）深化区域协同，促进城乡融合。深化区域协同与城乡融合，是实现“两山”理念实践均衡发展的重要支撑。打破行政区域壁垒，建立跨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协作机制，在流域治理、生态修复、产业转移等方面加强区域合作，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支持农村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促进城乡生态资源共享、产业互补、协同发展。

4.2 “两山”理念实践的创新发展趋势

（1）科技赋能：数字技术深化生态治理与价值转化。在建设数字生态文明背景下，数字技术将成为“两山”理念实践的核心驱动力。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全域覆盖、实时动态的生态监测网络，实现对生态系统的精细化管理。例如，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与地面传感器相结合的“天空地一体化”技术，对森林、湿地、河流等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监测，精准掌握生态系统变化态势，及时预警生态风险。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方面，区块链技术将重塑生态产品交易体系，通过建立可信的生态产品溯源与价值评估机制[15]，提升生态产品市场认可度与溢价能力。如基于区块链的碳汇交易平台，可实现碳汇项目全生命周期透明化管理，保障交易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推动碳汇市场规模化发展。

（2）产业融合：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深度融合。生态产业化将向高端化、集群化方向发展，围绕生态资源开发形成完整产业链。以森林资源为例，除传统木材加工外，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新业态将成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为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形成“种植—加工—服务”一体化产业集群。同时，产业生态化转型加速，传统农业、工业、服务业全面融入绿色发展理念。在农业领域，智慧农业、有机农业成为主流，通过精准施肥、智能灌溉等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的绿色低碳；工业领域，绿色制造、循环经济成为主导模式，构建企业内部、园区内部及产业间的循环产业链，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废弃物零排放；服务业则积极推广绿色消费、绿色物流等模式，促进产业生态化全面升级。

（3）制度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升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持续创新完善。首先，生态补偿机制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参与，探索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模式。例如，通过建立生态保护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保护领域；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试点，由生态产品受益方直接向保护方支付费用。其次，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进一步拓展，除碳排放权交易外，水权、排污权、用能权等交易市场将逐步完善，形成统一、规范的生态环境权益交易体系。再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应逐步健全，绿色金融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20]，如通过开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最后，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考核机制，将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推动地方政府更加重视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从制度层面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长效性与稳定性。

（4）社会参与：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生态长效机制。随着公众生态意识提升，绿色生活方式将从倡导走向自觉。在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成为主流趋势，消费者对绿色产品、低碳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推动企业加大绿色产品研发与生产。在生活方式方面，绿色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能源等行为成为社会风尚，通过建立绿色生活激励机制，如绿色积分、碳普惠等，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绿色生活实践。同时，生态文化教育深度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与社会宣传体系，培养全民生态自觉，形成全社会共建共享生态文明的良好局面。

（5）区域协同：城乡融合发展迈向纵深协同推进。区域协同将从单一领域合作向全方位、深层次协作转变。在生态保护方面，跨区域生态联防联控机制更加完善，如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点区域，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执法与应急响应体系，共同守护区域生态安全。在产业发展方面，区域间产业转移与协同创新加速，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绿色产业，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将进一步深化，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生态资源开发与特色产业发展，实现城乡生态环境共美、经济发展共赢，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两山”理念实践在城乡均衡发展，进而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CRUTZEN P J. Geology of mankind [J]. Nature, 2002, 415: 23-23.

[2] ROCKSTRÖM J, STEFFEN W, NOONE K, et al.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J]. Nature, 2009, 461: 472-475.

[3] 谷树忠，胡咏君，周洪. 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J]. 资源科学，2013，35（1）：2-13.

[4] 黄承梁.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历史自然的形成和发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12）：1-8.

[5] 董战峰，张哲予，杜艳春，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践模式与路径探析[J]. 中国环境管理，2020，12（5）：11-17.

[6] 王金南，苏洁琼，万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机制创新[J]. 环境保护，2017，45（11）：13-17.

[7] 沈满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从“两山”重要思想到生态文明思想体系[J]. 治理研究，2018，34（2）：5-13.

[8] DAILY G C. Nature’s services: 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 [M].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1997.

[9] 欧阳志云，王如松，赵景柱.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评价[J]. 应用生态学报，1999（5）：635-640.

[10] 徐彩瑶. 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率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理论、方法与浙江实例[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4.

[11] 赵慧霞，吴绍洪，姜鲁光. 生态阈值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2007（1）：338-345.

[12] 唐海萍，陈姣，薛海丽. 生态阈值：概念、方法与研究展望[J]. 植物生态学报，2015，39（9）：932-940.

[13] 徐磊. 习近平“两山论”再探：生态生产力的新视界[J]. 广西社会科学，2019（6）：18-22.

[14] 张雪溪，董玮，秦国伟. 生态资本、生态产品的形态转换与价值实现：基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扩展分析[J]. 生态经济，2020，36（10）：213-218.

[15] 徐彩瑶，孔凡斌.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34（11）：163-177.

[16] OSTROM E, BURGER J, FIELD C B, et al. Revisiting the commons: Local lessons, global challenges [J]. Science, 1999, 284: 278-282.

[17] COASE R 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M]// GOPALAKRISHNAN C, ed. Classic Papers in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60: 87-137.

[18]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 齐月，李俊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模式探讨[J]. 生态经济，2024，40（3）：215-219.

[20] 程翠云，李雅婷，董战峰. 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绿色金融机制创新研究[J]. 环境保护，2020，48（12）：35-39.

（责任编辑：冯胜军）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